

編者的話

《全真道研究》第三輯與第一、二輯同中有異。相同的是，這三輯皆有一個主題，第一輯的主題是“探古鑒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第二輯的主題是“全真道與明清社會”，而第三輯的主題則是“金石學視野下的全真道”。第三輯的主題乍看起來似乎範圍很窄，但實際上我們的初衷却很簡單，即用碑刻材料來研究全真道，所以祇要是在文章中運用了碑刻材料，就算是符合主題。不同的是，前兩輯皆是以學術會議為依託，稿子主要來源於會議論文，而第三輯的稿子則主要來自約稿。而且，為了培養《全真道研究》的作者團隊，我們這一次約稿的對象主要是青年學者。此外，第三輯還發表了三篇書評，這是我們新增加的一個欄目，以後每輯都要發表二至三篇書評，以介紹國內外學術界的最新成果。

包括三篇書評在內，本輯共收十四篇文章，其中絕大部分都按照主題要求使用了碑刻材料，祇有極少數例外。根據研究內容的不同，這十四篇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四組。

第一組有四篇文章，主要是關於全真道學術前沿的研究。王宗昱《目前全真道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主要對已經成為熱潮的全真道研究加以批評反省，其詳細介紹了當前全真道研究中的新材料、新問題、新趨向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明顯不足。卿希泰《道教研究的新成果》一文，是為蓋建民教授新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道派、歷史、文獻與思想綜合研究》所作的序言。卿先生首先指出了目前金丹派南宗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接着又詳細介紹了金丹派南宗的思想特色，最後充分肯定了蓋建民教授《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一書的學術價值，認為該書“是道教宗派研究的一項新成果，有重大創獲”。趙衛東《金元全真道研究的深入與拓展》一文，對張廣保教授《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一書作了客觀的評價。他指出該書具有“針對性強，問題意識強烈”、“選題精專，研究深入”、“視野開闊，視角新穎”、“資料詳實，內外互證”等四個方面的特點，而且認為該書開拓了全真道的研究領域，提出了極富有創造性的觀點，促使金元全真道研究進一步走向了深入，

是“近年來全真道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部真正具有開拓性與創新性的學術著作”。秦國帥《何種仙史？誰為正宗？》一文，對景安寧新著《道教全真派宮觀、造像與祖師》一書進行了評論，認為該書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推動了學術界關於全真教神聖歷史建構問題的研究。（二）回答了全真教在轉型時期如何處理與傳統道教關係的問題。（三）提供了全真教研究中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極佳範例。在此基礎上，高度評價了該書的價值，稱其為“近年來全真道研究的力作之一”。

第二組有五篇文章，主要是關於區域全真道的研究。王崗《甘青民族地區道教考》一文，集中考察了甘青地區臨夏萬壽觀、二聖宮、夏河關帝廟和西寧土樓觀以及其中全真道的情況，最後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這些道廟的絕大多數信眾是被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邊緣化的漢族民衆，有其漢族民衆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需求。（二）以上各道廟自覺與各民族、各宗教和平相處的意願和追求，成了甘青民族地區道教的特點，也是當地道教包括在宮觀中活動的全真道的生存和發展策略。梅莉、張朗《晚清武漢長春觀的崛起》一文，對晚清時期武漢長春觀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得出了其崛起“得益於長春觀的道教領袖們審時度勢、道人的費心經營、地方當局的大力支持以及逐漸增強的經濟勢力”的結論。汪桂平《〈康泰真碑〉探微》一文，對元代東北全真高道康泰真的墓碑進行了詳細研究，認為“‘康泰真碑’是東北地區現存較早的道教碑刻，也是東北地區現存最早的全真道士的墓碑，是研究金元之際全真道傳播的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並在此基礎上考察了金元時期全真道在東北的傳播，認為“金元之際全真道已經在東北地區有着廣泛的傳播和影響，並形成興盛之勢”。張球《泰山全真道與元代東嶽祭祀》一文，對全真道在元代東嶽祭祀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探討，最後認為：“在元代東嶽祭祀的恢復過程中，泰山地區全真道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全真掌教代祀東嶽及東嶽祀典的最終確立也促進了該地區全真道的發展。”秦國帥《山東全真教的教團規模、分枝岔派與地域分佈(1368~1949)》一文，從教團規模、分枝岔派與地域分佈三個方面對明清時期山東全真教進行了研究，最後得出以下三點結論：（一）在教團規模方面，山東全真教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上。（二）在分枝岔派方面，共計約有十七枝全真岔派在山東境內流傳。（三）在地域分佈方面，明清山東全真教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地緣性分佈狀態。

第三組有三篇文章，主要是關於全真道宗派問題的研究。趙衛東《李常明一系龍門派傳承考》一文，對李常明一系龍門派在山東即墨馬山和東北鐵刹山的傳承情況進行了詳細考察，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以下兩點結論：（一）全真道龍門派起源與傳承非“一源多流”，而是“多源衆流”。（二）關於明清時期道教衰落的說



法存在問題。張雪松《全真道派輩字譜發隱》一文，對全真道派輩字譜的起源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明代中後期，全真道諸派輩譜系確立，同當時“大禮議”之後，官方默許私建祠堂，宗族在各地興起的中國歷史大背景密不可分。而且，自派輩詩在全真道誕生之日起，不斷發展完善，對明清以來全真道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方《碑刻所見介休后土廟龍門派傳承》一文，對山西介休后土廟現存碑石進行了考察，發現在明正德年間，后土廟道士開始從“德”字輩傳續龍門派字譜，此後傳承不斷，達數百年之久。通過這一考察，最後其推測：龍門派在明代中後期的發展壯大，並不僅僅依靠法脈的傳承，龍門派字譜被廣泛認同應該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四組有兩篇文章，主要是關於其他方面的研究。尹志華《晚清全真道新探》一文，通過考察晚清時期北京白雲觀、盛京太清宮、南陽玄妙觀、西安八仙庵、漢中留侯廟、葭州白雲山道觀、成都二仙庵、湖州金蓋山純陽宮、杭州玉皇山福星觀等著名全真派道觀的發展情況，委羽山大有宮一系全真道脈在浙南的繁衍，以及衆多宮廷太監加入全真道的現象，得出了“晚清時期全真道仍然相當興盛”的結論。章偉文《全陽子俞玉吾的道教易學思想》一文，對宋末元初俞琰的道教易學思想作了探討，他認為，俞琰的學術與金元全真道關係密切，其易學內丹學將道教內丹修煉與易學的象數形式、義理內容相結合，將神仙還丹之道歸結為《易》的太極之道。同時，俞玉吾道教易學的建立還是對佛教禪學加以“揚棄”的結果。

